
评新华版《张学良文集》

成 学

在近代中国,张学良将军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对国家和民族,对国共两党,都曾作出过重大贡献。因此,编印一套张氏文集,对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对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史,对研究中日两国关系史,对研究张氏的生平和思想,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自从张氏被幽禁之后,张氏的言论和文字大多湮没散佚,搜集起来格外困难。现在,新华出版社刚刚出版的两卷本《张学良文集》(毕万闻主编),解决了这个难题。

这套文集,收入了张学良生平各个时期(下限到1991年6月)的电报、演辞、信函、谈话、文章、训令、诗歌等原始文字共873份,近90万字,约有一半是新挖掘出来的孤藏史料。这些新发现的珍贵资料连同其他史料,披露了张氏与北洋军阀各派系、国民党各派系及二、三十代中国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的内幕关系;展示了张氏如何效忠于乃父张作霖,如何服从国民党和蒋介石,以及在民族危机的生死关头,如何宁肯牺牲个人的一切,誓死促成国共两党携手抗日的曲折历程;显露了半个世纪幽居生活中难以明言的复杂情怀和新近重获自由之后的爱国衷肠。张学良出身于旧中国最腐败最落后的营垒,在跌宕中追求进步,在艰难中摸索真理,终于超越了环境和自身的束缚,成长为惊天动地的民族英雄,后来则忍辱含垢,不加辩白地默度余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跨度极大而又色彩斑斓的人生轨迹。新华版张氏文集尽可能地选收了张氏生平各个时期各个方面有代表性的言论,这为了解张氏的真实历史提供

了可信的第一手史料,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张学良准备了必要的前提。

编者对选入文集的原文进行了认真的校勘。举个例子说,其他一些史料集,包括早几个月印行的香港版本张氏文集(只出了上册),把《致张景惠电》和《致马占山电》,分别定为1931年12月29日和30日(见该书第215页),但新华版张氏文集却定为同年的11月29日和30日(见第1卷第536和538页),相差了一个月。到底哪个对哪个错?这两份电文说的都是日军被迫停止进攻锦州一事,而此事实际上发生在11月末。显然,前者搞错了。新华版对原文中缺、讹、衍等字句,勘误之处颇多,但为了节省读者时间,却大多不加校注。其注释安排得也颇为确当,可注可不注的不注,难注之处也如实地向读者讲明,没有视而不见似的“藏拙”。如《挽陈琛联》中的“知杨太尉在堂,忍把锦裘追往事”,笔者从前读到这两句时,曾请教过好几位学者,都未能查明典出何处,读了新华版的注释(见第1卷第93页)才明白了,出自《后汉书·杨震列传》。又如《序韩氏遗墨》提到“定海三总兵”,香港版(上册第97页)注释说,是指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抗日英雄邓世昌一个人,而新华版注释说,是指中英鸦片战争中(1841年10月1日)浙江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和王锡朋三位抗英烈士(第1卷第268页)。查阅史料,还是后者注得正确。读了新华版的题解和注释,觉得他们为文一丝不苟,颇见功力,显系对张氏事功作了一番研究的结果。新华版所收篇目都严格依照时间先后排列,读者查找起来也十分方便。

正如编者在文集后记中所说,由于主客观原因,新华版文集“还不十分完善”,如第1卷第336页中把原电删掉了,而附电却印上了。好在类似的毛病不多。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张氏文集注意编校质量,不失为海内外编注得较好的一套张学良文集,这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中的一项有价值的成果,确实可喜可贺!

(作者单位:长春大学历史系)